

《名理探》与《辩证法大全注疏》 比较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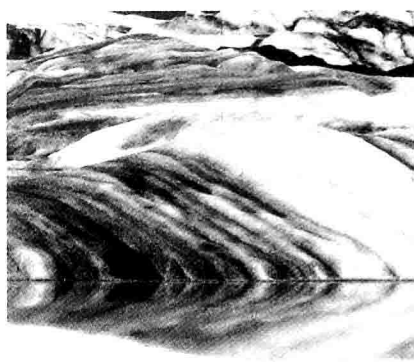
王建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名理探》与《辩证法大全注疏》 比较研究

王建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理探》与《辩证法大全注疏》比较研究 / 王建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161-4414-5

I. ①名… II. ①王… III. ①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
逻辑学—思想史—研究②逻辑学—思想史—研究—中国—明代③《辩
证法大全注疏》—研究④《名理探》—研究 IV. ①B502.233
②B81-095.45③B81-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34110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韩国茹
责任校对 任文娜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6.625
插 页 2
字 数 160千字
定 价 25.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一 理论背景与研究现状	(2)
(一) 关于中国的语言与逻辑	(2)
(二) 关于李之藻的生平	(3)
(三) 关于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4)
(四) 关于《名理探》	(6)
(五) 关于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与《名理探》的比较	(7)
二 基本问题与研究目标	(8)
(一) 基本问题	(9)
(二) 研究目标	(10)
三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11)
第一章 中国古代的语言与逻辑	(19)
一 语言与逻辑	(22)
(一) 语言与逻辑的相关性	(22)
(二) 中国的语言与逻辑	(27)
二 孔子与正名	(37)
三 《墨经》是中国传统思维的突破?	(40)

四 因明学的走向	(43)
五 讨论和小结	(45)
第二章 《名理探》译者李之藻生平	(47)
一 李之藻生平	(48)
二 讨论和小结	(82)
第三章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与《名理探》	(84)
一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简论	(84)
(一)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的出版目的	(84)
(二) 翻译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的原因	(94)
二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与	
《名理探》的异同	(101)
(一) 《名理探》是烦琐的吗	(102)
(二) 《名理探》对于逻辑学地位的描述以及	
明末知识分子可能的反应	(110)
三 讨论和小结	(117)
第四章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与	
《名理探》比较分析	(120)
一 导 论	(120)
二 范畴的识别	(127)
(一) 十范畴的识别	(128)
(二) “何”的困惑	(133)
(三) “互视者”中的关系事物	(136)
三 从全称到“游移特一”	(139)

四 命题与存在	(153)
(一) “文”与命题	(153)
(二) “有”与存在	(159)
五 讨论和小结	(163)
第五章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与	
《名理探》比较的意义	(165)
一 对比较逻辑的意义	(166)
二 “定论”中的误区	(168)
附录一 《名理探》中部分人名与术语	(174)
附录二 《亚里士多德全集》目录中英拉丁语对照 ..	(184)
附录三 <i>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i> 书影	(188)
参考文献	(192)
后 记	(203)

绪 论

将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即《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注疏》，简称《辩证法大全注疏》）与《名理探》做对比研究，即使在逻辑思想史中这一内容也是非常少见的。对于《名理探》的评价几乎已经盖棺定论了，但是事实又是怎样的呢？除了这些“定论”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角度呢？任何一种“定论”的死角或许就是另一种新见解的萌发之地。我们的逻辑学家或者汉学家一直执着于研究中国古代与西方语言和逻辑之间的关系，但是这种研究是在分别分析之后再进行比较的，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每一种分析都是单独进行的。而他们始终没有注意到《名理探》。《名理探》是什么？它是中西逻辑思想的第一次碰撞，是真正的两种逻辑与语言的交互，是比较逻辑的经典著作，甚至可以说，《名理探》开创了中国比较逻辑的先河。那么通过《名理探》与《辩证法大全注疏》的比较进而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末）的逻辑思想将会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从中可以发现很多中国与西方逻辑思想的差异，而且这些差异是明末知识分子在与西方逻辑思想接触的过程中主动暴露出来的。可惜的是这一研究却几乎无人进行！或许这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关：研

究二者的关系还需要语言上的准备。所谓语言上的准备，应该是极为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中国人而言，因为这里需要的是拉丁语。因此如果研究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与《名理探》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要有许多最为基础性的工作，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又是极为漫长的，而且很难出成果。

一 理论背景与研究现状

中国的逻辑学家或者思想家以及国外的汉学家在中国语言与逻辑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展很久了，而且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下面就与本书有关的一些成果，依照本书的关注点依次简要地列举出来。

（一）关于中国的语言与逻辑

中国人（甚至有些汉学家）对于中国语言与逻辑的分析，往往受到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的影响。但是冯友兰先生所写作的关于中国古代逻辑的文章，我们宁可认为是他本人思想的发挥，却不能把它当作是古人的本意。首先古人不可能有那么明晰的思想体系，再者，他的切入角度也未必是正确的。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在其所写的《思想的范畴与语言的范畴》（*Catégories de Pensée et Catégories de Langue*）一书中认为，语言和思维具有同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大都符合希腊语的语法形式，而且这些也不能够为现代西方语言所共享。中国的语言与逻辑又是一幅怎样的景象呢？陈汉生（Chad Hansen）在《中国古代的语言与逻辑》（*Language and Logic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提出了一种观点，

认为由于古代汉语语言由“名”构成，“名”与“实”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个体”不过是由“名”所标示与指称出来的整体之中的一部分而已，故而不具有任何西方意义上的或者柏拉图意义上的抽象。在中国的逻辑系统中，没有抽象实体的理论，也没有精神实体的理论。葛瑞汉（Angus Charles Graham）在《论道者：中国古代的哲学论辩》（*Disputers of the Tao: Philosophical Argument in Ancient China*）一书中赞扬并描述了这种观点，他随后在 *The Disputation of Kung - Sun Lung as Argument about Whole and Part* 一文中发挥了这一观点。但是这一观点被郝大维（David L. Hall）与安乐哲（Roger T. Ames）在《通过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一书中发挥至极致，他们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古代汉语没有实体论的指称服务于这些命名行为的规范，在严格意义上也就没有客观语言，名称的指称功能或角色自身是别的名称，因此在严格意义上，可能既没有内涵定义也没有外延定义。这一定论将会导致中国古代汉语无法用理论进行描述。何莫邪（Christoph Harbsmeier）在《物质名词假设与〈白马篇〉的“整体一部分”分析》（*The Mass Noun Hypothesis and the Part - Whole Analysis of the White Horse Dialogue*）一文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将汉语名词划分为三类，基本有效地解决了上述问题。

（二）关于李之藻的生平

葡萄牙籍耶稣会士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 1585/1586—1658）曾经用葡萄牙文撰写过李之藻传，当是最早为李之藻立传的人。曾德昭在中国期间与李之藻同时，故而这一传记可能是非常准确的一部，但是失之简略，许多细节难以把

握。《康熙开州志》中有李之藻的简历，简略地介绍了李之藻在开州时期的宦绩。《康熙仁和县志》也写到了李之藻的贡献。此后，清朝学者阮元《畴人传》卷三十二为李之藻立传，不过这个“传”实际上只有简单的一小段是关于李之藻生平的，其余则是从李之藻的奏疏中抄录出来的关于历算的文献。1919年，陈垣先生作《明浙西李之藻传》，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李之藻的一生，可惜或多有遗漏，或语焉不详。随后，方豪先生努力收集各种资料，陆续汇编，结集成为《李我存研究》于1937年出版，其中错误也是显而易见的。于是方豪先生更加精益求精，再次于1966年写成《李之藻研究》，该书搜集了方豪先生所能见的各种材料，并且把《李我存研究》中的错误也一一加以更正。1970年，方豪先生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再次为李之藻作传。2005年汤开建与马占军的《〈守圉全书〉中保存的徐光启、李之藻佚文》（《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年第2期）提供了李之藻生平的一些资料，并给出了《恭进收贮大炮疏》全文。2008年龚缨晏谓其在上海图书馆与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发现馆藏《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履历便览》，于是增益其说，写成《关于李之藻生平事迹的新史料》，同时也报告了一些最近发现的资料，可惜限于篇幅，许多重要的资料以及事迹未能加以收录。

（三）关于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全名为 *Commentarii Collegii Conimbricensis Societatis Jesu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耶稣会立科英布拉大学讲义：亚里士多德辩证法大全注疏》），原是葡萄牙的科英布拉（Coimbra）以及艾维拉

(Évora) 这两所大学的教科书。李之藻与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傅泛际 (Francois Furtado, 1587—1653) 有感于中国人缺乏逻辑思维训练, 于是翻译是书为《名理探》。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初版于 1606 年, 奥地利神学家卡尔·沃纳 (Karl Werner 或 Carl Werner, 1821—1888) 说这部注释集是科英布拉的耶稣会士奉献给世界的一部名著。比利时编目学家 A. 贝克尔 (Augustin de Backer, 1809—1873) 则给出了所有版本的明细表。由爱德华·克雷格 (Edward Craig) 编辑的《劳特利奇哲学百科全书》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在第十卷中简单地分析了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的内容以及影响。1985 年 J. P. 道尔 (John Patrick Doyle) 在《符号学》 (*Semiotics*) 杂志上发表《科英布拉人论符号中的关系》 (*The Conimbricenses on the Relations Involved in Signs*) 一文, 介绍了这套书中的符号学理论。1987 年 C. H. 洛尔 (Charles H. Lohr) 写作《拉丁文亚里士多德注释》 (*Latin Aristotle Commentaries. II Renaissance Authors*) 一书, 在书中介绍了科英布拉注释集的书目信息。由马里安·帕德 (Marianne Pade) 于 2001 年编辑的《亚里士多德全集的文艺复兴时期读本》 (*Renaissance Readings of the Corpus Aristotelicum*) 一书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的价值。

李约瑟 (Joseph Needham) 与何莫邪 (Christoph Harbsmeier) 在《中国科技史》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有 Language and Logic (语言与逻辑) 一章, 论述了中国的语言与逻辑, 并简要论述了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在中国的情况。或许很多“定论”的源头来自这里, 不过他们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 而后来引用者也没有深入研究。由于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是一套拉丁文书籍，所以国内基本没有研究。方豪先生曾经两相校对，但是没有文章详细说明，只是简单地在《李之藻研究》中说：“民国三十五年，余寓北平，尝取译本与原本互校，知译本乃义译，而非对译；可略则略之，而仍不失其‘信’。”香港大学冯锦荣曾在 2009 年世界汉学大会上做过一篇《明末知识分子对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研究》（*The Studies of Late Ming Scholars Concerning Aristotle's Philosophy of Nature*）的报告中提及这套书，不过并没有深入研究。

（四）关于《名理探》

1627 年，李之藻与傅泛际开始翻译《名理探》，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李之藻已经一目失明，仍然孜孜不倦，可惜这套书没有能够在他生前出版。最早系统研究《名理探》的当数方豪先生，他在《李之藻研究》中对李之藻生平、著述、事功等，均有深入的考辨。全书共分十三章，其中第十章“李之藻之译介理则学——《名理探》”对《名理探》有详细的论述。他分别研究了《名理探》各国所藏版本、刊本、底本、翻译的经过、已译以及已刻卷数等。1982 年曹杰生写作《略论〈名理探〉的翻译及其影响》（载《中国逻辑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为大陆首次研究《名理探》者，可惜其中错误非常之多。2000 年深泽助雄撰《〈名理探〉：中国译介亚氏逻辑的成就》一文〔孙中原译，《哲学与文化》（台湾）第 12 期〕，从日本人的眼界观察中国的这一译介工作，认为它是中西逻辑交流史上的一次杰作。2001 年张西平出版《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一书，单列“入

华传教士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介绍”一节，较为详细且公允地介绍了《名理探》的情况，但是有些结论仍然是不正确的。赵敦华在《第一次中西文化交流得失之考察》（《东南学术》2003年第3期）中，从“西学各部在中国的不同待遇”研究了《名理探》等的境遇。解启扬等《西方逻辑的输入与明末文化思潮》[《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结合明末思想环境分别介绍徐光启与李之藻的译述及思想。周云之主编《中国逻辑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对这一内容有一概略性的表述，但限于逻辑学角度，对李之藻翻译及《名理探》之未能流行的原因仅以文字晦涩、内容陈旧概括。

（五）关于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与《名理探》的比较

徐光台在《明末西方〈范畴论〉重要语词的传入与翻译：从利玛窦〈天主实义〉到〈名理探〉》[《清华学报》（台湾）新35卷2006年第2期]中比较探讨了古代汉语范畴与西方逻辑范畴在相遇的时候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尽管可能与本书无关，但是荷兰人安国风博士（Peter M. Engelfriet）的《欧几里得在中国：汉译〈几何原本〉的源流与影响》[*Euclid in China: The Genesis of the First Chinese Translation of Euclid's Elements, Books I – VI* (Jihe Yuanben, Beijing, 1607) and its Reception up to 1723]一书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目前国内仍然没有关于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与《名理探》的比较研究，一方面这一研究太过于冷门，而且很难出成绩；另一方面，还需要学习一门外语——拉丁语。因此对于这两本书的比

较研究有太多的基础性工作需要做，而且即使开始研究，也是前途渺茫，令人望而却步。

总而言之，甚至在中国语言与逻辑的分析方面，中国人也不占有明显的优势，在某些方面还落后于西方的汉学家或者研究者，这一现状显得有些意味深长。我们仅以《名理探》与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为例，国内研究《名理探》的结论是“烦琐”，并且其中充满了令人反感的宗教气味，因此大大地落后于时代了，明末知识分子无法识别它也是应该的（甚至是明末知识分子的幸运）；但是 J. P. 道尔却从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中整理出了 *The Conimbricenses on the Relations Involved in Signs*，并标明说这一“论符号”（*De Signo*）是现代符号学的曙光，甚至在 17 世纪，耶稣会士就已经开始研究符号学了——这又与传统的耶稣会士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不树新义（*novatores sententiarum*）是耶稣会的一项基本原则；但是耶稣会士在科学教育、科学研究诸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原创性的贡献，尤其是他们支持了一种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命题，即科学发展乃是一种渐进的过程，而不是革命性的突变——无论他们意识到与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而且目前可能无法找到有效的答案。

二 基本问题与研究目标

依照前述的理论背景与研究现状，本书试图解决三个问题，通过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与《名理探》的比较研究，审视中国古代语言与逻辑的优缺点。

（一）基本问题

第一，整理《名理探》译者李之藻的生平。天主教三柱石中，国内研究徐光启的最多，而李之藻则次之。这是因为徐光启的文献保存得最为完备，李之藻的文献则散见于不同的书籍当中，所以整理起来相当的困难，更为令人叹息的是关于李之藻的很多书籍以及事迹都已经散佚了。近几十年来，对于李之藻的文献与事迹的整理工作也已经有所起色，比如陈垣先生所写的传记，方豪先生所作的《李之藻研究》。但是现在新资料又出来了很多，而且很少有人加以细心详细的整理，因此，本书第三章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将李之藻的生平事迹明白清晰地整理出来。

第二，找出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的真实状况。*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的出版原因是什么？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地位如何？它对后世的影响又是什么？它与《名理探》的关系是什么？李之藻与傅泛际为什么要翻译这一套书？他们各自的目的又是什么？他们达到各自的目的了吗？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是如何看待这一翻译著作的？尽管凡是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史的书籍必定会提到《名理探》，对于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却是言之不详，或者间有差错。因此我们将依次解决上述这些问题，并且指出从前某些定论的错误之处。

第三，*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演化为《名理探》是历史上一次跨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件。《名理探》不仅仅是哲学翻译的一个示例，曾经被斥责为具有地域性语言特性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著作却被翻译为中文这一完全与印欧语系不同的

语系。有些人可能会就此推断说《名理探》作为一个翻译著作做得很好，但是事实上在中国的失败却导致我们对翻译为何语言——在这里尤其指中文——的《范畴篇》有效性的反思。我们在第五章中主要讨论了当印欧语系遇到汉藏语系，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李之藻与傅泛际是如何用当时的汉语语言来处理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的，这种处理方式有什么好处，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在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主要采用的是个别分析的方式，例如我们分析了“十范畴的识别”；“‘何’的困惑”；明末中国人无法区分单数名词与复数名词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更进一步，明末中国人无法区分特称、全称，在逻辑翻译与认知中将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在命题的建立过程中，明末知识分子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等。我们最终试图显明这些西方逻辑范畴进入中国之后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明末知识分子理解这些范畴时的困境。

（二）研究目标

本书意图借助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与《名理探》比较研究，首先澄清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的本来面目，它不是中世纪烦琐哲学的代表，而是高度体系化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它也孕育了现代逻辑。《名理探》的翻译是中西思想交流史上的一部杰作，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不同于中国思维的崭新的科学，在这一科学面前，中国古代语言与逻辑全面地审视了自己的优缺点。

作为语言学相对主义测试对象的《名理探》，西方逻辑学在中国的失败促使我们对翻译的《范畴篇》进行有效的反思，

《名理探》可以作为语言与逻辑之间关系的首要见证。尽管《名理探》以失败而告终，*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演化为《名理探》却是历史上一次跨文化交流的典型事件，这是无法否认的。亚里士多德的新学生，晚明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将这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时候肯定是学到了某些东西。本书旨在在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与《名理探》的比较分析中探究中西语言与逻辑的关系。

三 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共分为六部分，依次论述了中国古代的逻辑与语言；李之藻的生平；*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与《名理探》的关系；而后将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与《名理探》的内容进行了比较分析；最后试图得出对 *In Universam Dialecticam Aristotelis* 与《名理探》进行比较分析的意义。

绪论主要分析了本书写作的理论背景与研究现状，提出了基本问题与研究目标，并且简要地论述了本书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第一章叙述中国古代的逻辑与语言。在这里我们预设的前提是中国有逻辑——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仍然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需要讨论的是中国有没有系统地研究逻辑学的著作，并且这一研究是不是一种持续的过程。我们首先分析语言与逻辑的相关性。印欧语系当中，学习语言与语法就相当于某种程度的逻辑练习，这一结论可以在埃米尔·本维尼斯特所写的 *Catégories de Pensée et Catégories de Langue* 中得到确证，他证明了语言和思维具有同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范